

潮州歌册的女性文化特质研究

刘文菊

(韩山师范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41)

摘要:潮州歌册作为一种自娱互乐的民间说唱艺术,与女性有着天然的联系,是女性化的潮汕民间文化形态,有着鲜明的女性文化特质。从传唱主体看,歌册的传唱者多数是女性,不仅主唱者是女性,听唱的群体也主要是妇女儿童。从传承方式上看,歌册主要是通过家庭成员中的女性谱系代代口耳相传。从传唱空间看,歌册主要是在庭院、绣房、厨房、姿娘仔间等女性空间流传,与女性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从传唱题材来看,传统歌册的主题以教化女性遵守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体现了传统男权思想。从文化功能看,歌册是女性的娱教方式,是女性的启蒙课本、教科书和精神乐园。从传承规律来看,歌册与女性的生命历程紧密相联,女性的个体生命史折射了歌册的兴衰发展史。

关键词:潮州歌册; 女性文化; 特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1-0065-04

自2011年至2015年,我们深入到歌册曾经流行的潮州、揭阳、汕头、汕尾四市,寻找民间歌手进行口述访谈,本次调查共寻访到40人,其中,女性35人,男性5人,获得了大量翔实的口述访谈材料^[1]。调查数据和口述史料显示,潮州歌册与潮汕女性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是女性化的潮汕民间文化形态,有着鲜明的女性文化特质。

一、从传唱主体来看,潮州歌册的传唱者是女性

潮州歌册的作者并不是女性,薛汕认为“潮州歌册的作者,与其他的民间读物一样,无名作者众多,能知道的作者,不外两三人,或三四人而已。但是究竟是哪些人呢?落第的秀才,失意的

文人或自称风流的骚客。当潮州歌册兴盛的时候,就不仅上面的一些人,账房先生、戏老爹(即潮剧的导演)都参加了,后来的一些新歌册,不少是知识分子、学校教师写的”^①。

从传唱主体来看,虽然歌册的创作者不是女性,但是,歌册的传唱者多数是女性,不仅主唱者是女性,听唱的群体也是妇女儿童,未成年的男性会跟随年长的女性听唱歌册,成年男性少有介入者。尚未见文献史料记载上层知识女性传唱歌册,在《潮州诗萃》“闺阁卷”中辑录有22位潮汕女诗人,其中在诗人濮九娘词条下记载,她曾是韩江船上歌妓,从良后做了光绪己丑举人谢锡勋的侧室,唱过丈夫根据小说《荔镜奇逢》改编的传奇《荔枝记》^[2]。从传唱人群来看,歌册几乎是

收稿日期:2017-11-08

基金项目: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潮州歌册与潮汕女性文化研究”(项目编号:GD11XZW02)

作者简介:刘文菊(1968—)女,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女性文化的教学和研究。

女性的群体性文娱活动,在传唱人群中有多余空闲较多、乐于教唱的老年女性;有天真好奇、乐于听唱的少年儿童;有富有活力、乐于学唱的姿娘仔;有忙里偷闲、偶尔听唱的中年女性。在歌册发展的繁荣时期,蓬勃向上的青年女性群体是推动歌册发展的生力军。歌册有着广泛的女性群众基础,曾经是盛极一时的女性化民间说唱艺术。

歌册的主唱者多数是业余爱好者,职业歌手居少。其中职业歌手多是下层中年女性或退居的女艺人,以唱歌册换取财物补贴家用;以唱歌册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极少,一般是走村串户的行乞者,她们靠唱歌册换取少量钱粮物品。业余主唱者通常是人群中公认的优秀者,她们义务为大家唱歌,并不收取报酬,她们通常会受到听众的爱戴。多数歌手不识字,仅靠口耳相传,甚至少数歌手先学会唱,后学会识字,进而自己创作歌谣和歌册。

二、从传承方式来看,潮州歌册主要通过女性谱系传承

从传承方式上来看,歌册主要是通过家族成员中的女性谱系代代口耳相传。多数女歌手在童年时期听女性长辈唱歌册,到了青少年时期就跟着她们学唱,成年以后再教会下一代女性。男歌手通常也是跟着家族中的女性成员或者女性邻居学会唱歌册的,男性之间相互传承歌册的情况较为少见。大多数女性是在家里跟亲人和邻居学唱歌册,这主要包括奶奶、外婆、母亲、婆婆、姑姑、婶婶、姨妈、嫂子等家庭中的女性人群,以及邻居阿姨、阿姆、阿婶等女性人群,通过女性谱系代代相传。

歌册常见的传唱形式是一人主唱,众人围坐在一起边做家务或手工边听唱,三五成群,或者数十人,多至三四十人,规模有大有小,主要是女性人群聚集在一起听唱歌册,大部分人是在家里或者邻里街坊之间唱歌册,传唱的时间主要是在晚饭后闲暇的时候,有时也在中午短暂休息的时候。从学唱歌册的年龄来看,大多数女性是在20岁左右做姿娘仔时开始的,而且其唱歌册最痴迷的时期大都是在15~22岁之间,多数是在姿娘仔间跟同伴一起唱歌册,为了补贴家用,她们在姿

娘仔间里边做钩花、抽纱、织网等手工,边唱歌册,唱歌册成为她们识字、学习文化知识和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大多数女性在20岁左右结婚,因婚后生活负担加重,忙于家务和生计,空闲时间减少,以及同伴分散等原因部分女性很少再唱歌册。

三、从传唱空间来看,潮州歌册主要在女性空间流传

从传唱空间来看,歌册主要是在庭院、厨房、绣房、姿娘仔间等女性空间流传,与女性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歌册的传唱渠道非常通畅,无论是在住宅庭院、房前屋后、村头树下,还是在田间地头、纱厂绣房、姿娘仔间,到处都能听到唱歌册的声音。凡是女性生活、劳作、休闲的场所,都是传唱歌册的舞台,并且舞台上的主角是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女性,唱歌册成为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年轻女性而言,更多的时候是晚上聚集在姿娘仔间边做手工边唱,已婚女性大多在睡前唱给子女和家人听。另外,在汕尾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在善堂、寺庙、祠堂等“拜拜”^②时,也会传唱劝世文之类的歌册。

歌册的接受群体主要是中下层女性,以农村女性居多,城镇女性也有一部分,并没有上层女性和知识女性。但是在更偏远、更贫穷、更分散的小村庄,妇女们忙于生计,无力无暇传唱歌册。潮汕地区明清时期的下层妇女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歌册成为她们休闲娱乐、接受教育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里,男尊女卑的性别权力划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贤妻良母的女性价值定位,决定了女性历史地位的低下。歌册成为下层女性的休闲文化,并不是因为女性地位高得到的“文化特权”,而是因为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念认为歌册的俚俗、粗糙,不能登大雅之堂,才被真正有文化特权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所鄙弃,这种文化形态揭示了传统文化男尊女卑的实质。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执行,女性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使得女性与男性享有了平等的权利,歌册的式微乃至失传,也正是女性社会地位发展变化的结果,一部潮州歌册的兴衰史见

证了潮汕女性地位的变迁史。

四、从传唱主题来看,潮州歌册体现了传统男权文化思想

从传唱主题来看,流行歌册的主题以教化规约女性为主,体现了传统的男权文化思想观念。歌册的创作主体并不是女性,表现的也不是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独立自强精神,从严格的女性文学意义上讲,并不能称之为“潮州女性文学”,其中的女性观念、女性诉求、女性经验并不是女性真实生活的写照。传统男权社会文化外在的规约成为女性内在的传承,歌册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与潮汕明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比较接近,反映了落后的女性观^[3]。传统的男权思想认为女人的神圣职责就是“三从四德”、温柔贤惠、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在两性权力关系定位上,传统女性观主张男尊女卑、男强女弱,女人处于“第二性”的地位。

歌册的大部分主题都是规训女性遵从“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道德,如,《烈女配》中的秦月娥、《秦雪梅歌》中的秦雪梅、《明珠记全歌》中的王金真、《金花牧羊》中的金花等,即便是像《陈三五娘》中的黄五娘、《苏六娘》中的苏六娘、《海门案》中的杨牡丹这些反抗封建礼教、争取自由爱情婚姻的叛逆女性,也还是主要讴歌她们坚贞忠诚的品德。当然,新中国成立后,新改编的歌册表现了进步的女性观,如《中华革命军缘起》《缓婚配歌》《陈璧娘》《红灯记》《洪湖赤卫队》等。

歌册的男权思想比较鲜明,叙事结构以男性为主体,多表现男子历经磨难建功立业,与妻妾婢女大团圆的辉煌历程。叙事情节以男性为中心,多是女性自荐枕席、主动投怀送抱,男子迫于盛情难却才不得不妻妾婢“兼收并蓄”,人物关系多是“众女捧男”的男性中心格局,宣扬一夫多妻、妻妾婢成群,四美、五美、六美甚至八美团圆的夫权至上的男权观念。

五、从文化功能来看,潮州歌册是女性的娱教方式

从文化功能来看,歌册是女性的娱教方式,是女性接受教育和传承文化的载体。歌册是女性的启蒙课本,对于多数因家贫或因传统观念束缚而无法上学的女性来说,唱歌册是她们识字和

学习文化知识的最佳途径,从学唱歌册而识了字,有些甚至还学会了创作歌册。

多数民间女歌手学会了大量的歌册,跟“饱读诗书”的文人一样充满了自信,她们会自豪地说“我担了一箩筐的歌仔”^③“我一肚子的歌仔”^④。歌册寓文化教育于说唱之中,让女性既学会了识字,又提高了文化水平,开阔了视野,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扫盲启智的教育功能”^[4],这也是歌册广泛流传、深受勤奋好学的潮汕女性喜爱的原因。歌册是潮汕女性的教科书,歌册故事一定程度上贴近女性的生活感受,起到了一定的道德教化、伦理束缚、行为规范的作用,成为女性的生活教科书。歌册一定程度上带有民间朴素的思想观念,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有劝善的作用,唱歌册对女性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甚至会影响到她们的人生发展。有研究者认为“潮州歌册是潮汕妇女道德理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学习的教科书。”^[5]歌册是潮汕女性的精神乐园,潮汕女性素以勤劳能干、聪慧贤德而闻名,在姿娘仔时就能独挡一面,干农活、做手工、做家务等。多数女歌者对歌册十分痴迷,即使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也经常夜以继日地学唱,唱过的歌册化成其生命记忆中的一个部分,终生不会遗忘,即便是在几十年后,有些长达一两万字的歌册她们仍然倒背如流。歌册是女性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有不少地方题材的歌册,如《刘龙图》《方大人》《翁万达》《吴忠恕》《过番歌》等,反映了潮汕本土的风物人情、生活习俗、人文概貌,记载了潮汕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民风民性的整体风貌。

六、从传承规律来看,潮州歌册与女性的生命历程相联

歌册与女性的生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联,成为她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潮汕女性的生命史见证了歌册近百年的兴衰史,20世纪10~50年代,她们处于姿娘仔时期,歌册传唱最为繁荣,歌册的发展也处于兴盛时期;20世纪60~70年代,她们结婚生子,家庭负担加重,生活艰难困苦,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唱歌册,歌册的发展处于低落时期,这期间又经历了一些社会历史变

迁,有的人五六十年没有再唱过歌册,歌册逐渐衰落;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歌册本身发展的局限性,加上传唱人的年龄老化、身体衰弱等原因,歌册赖以生存的人群和传唱的空间逐渐缩小,歌册昔日繁盛的景象难以再现,这一民间传统说唱艺术濒临危亡。从歌册的生存现状看,当下唱歌册的人越来越少,多数人只是偶尔唱唱,总体上看,歌册已经逐渐淡出了潮汕女性的日常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广播、电视、潮剧等其他休闲娱乐方式。民间存世的女歌手的学唱时间主要集中在其20岁未婚之前,做姿娘仔时由于没有太大的家庭负担,空闲较多,这一时期是她们唱歌册最繁盛的时期。但是,大多数人因婚后生儿育女,家务加重,无暇唱歌册,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如没有了唱歌册的同伴,丈夫和家人不支持唱歌册等原因,而没有热情再唱歌册。这种随着女性婚前婚后生活情形发生改变而起伏和衰落的文化传承方式,体现了独特的潮汕女性文化色彩。

综上所述,潮州歌册跟剪纸、绣花、布艺等大多数民间艺术一样,与女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歌册被称为“潮汕妇女的百科全书”“潮汕女子文化”“潮汕女书”“潮语区女性文学”“闺中文

学”等。运用社会性别理论从女性的视角分析歌册的女性化特征,可以挖掘出歌册独特的女性文化特质。

注释:

- ① 薛汕《书曲散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 ② 潮汕人的“拜拜”是指在祈祷(佛)或瞻仰(已故人士)时所行的一种礼节。
- ③ 来自口述史料:李素兰(1917—),女,汕头市潮阳区铜孟镇屿北村人,2011年7月。
- ④ 来自口述史料:林玉霞(1942—),女,潮州市饶平县海山镇美宅村人,2012年1月。

参考文献:

- [1] 刘文菊. 潮州歌册的女性口述访谈研究及传承思考[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5): 10-14.
- [2] 温廷敬. 潮州诗萃[M]. 吴二持,蔡启贤,校点.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1. 1326.
- [3] 魏国英. 女性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57.
- [4] 袁尔纯. 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阐释[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 (5): 10-14.
- [5] 吴勤生,林伦伦. 潮汕文化大观[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342.

On the Female Cultural Traits of the Chaozhou Gece

LIU Wenju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41, China)

Abstract: As an art of folk rap for individual or group entertaining, Chaozhou Gece bore intrinsic connection with women. It was part of the feminine Chaoshan folk culture with distinct female cultural traits. The majority of Gece singers were women. Not only the singers but the audiences were mainly women and children as well. In view of its inheritance, the Gece was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mainly through female members in family. In view of the singing space, the Gece was performed mainly in courtyards, embroidery rooms, kitchens, Young women's gathering rooms and other female spaces, where females gathered and did their daily chores. The theme of Gece was mainly to educate women to abide by the feudal ethics and embody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ideology. In view of the Gece's cultural function, it offered a mode of entertaining and enlightenment to women and functioned as their text-book and spiritual paradise. From its rule of inheritance, we can see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Ge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at of the female, and that the history of individual women reflects the rise and fall of Gece as well.

Key words: Chaozhou Gece; female culture; trait

(责任编辑 赵莉萍)